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料 〈畢業紀念冊〉特展圖錄」

總論

姚浙生 *

前　　言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力日漸強盛，亟思模仿西方列強，向外擴張，為了逐步實現其鯨吞蠶食中國的大陸政策，西元 1894 年藉朝鮮「甲午農民戰爭」（日稱東學黨之亂），閔妃求援清國出兵之機會，亦積極出兵朝鮮，引發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敗於平壤與黃海，簽訂馬關條約，被迫割讓臺、澎給日本。

1895 年 5 月 10 日日本任命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臺灣總督，5 月 24 日由宇品港出發，同年 6 月 2 日與清廷派遣之全權代表李經方，在基隆外海，樺山所搭乘之御用船「橫濱丸」上，完成了臺灣的交割，5 月 29 日澳底，6 月 3 日基隆，清軍俱不戰而退；日軍分別於 6 月 6 日、7 日、11 日、14 日進入臺北城，17 日在總督府舉行「始政式」，是日本治臺之開始。

緒　　論

日本對於如何治理臺灣這個新取得的殖民地，並沒有充分的準備也沒有類似的經驗，除以「殖產興業」攫取各項資源，作為支援殖民母國「富國強兵」政策為中心目標外，對於其他政務的推動，大都在嘗試及摸索中採取隨機應變的方式進行，朝令夕改，變動頻頻，教育事業的推行，也大率如此，，領臺五十一年間，隨著世界局勢的演變、日本國情的需要、臺灣經濟的發展以及臺灣民眾的要求，學校教育先後有過數次重大的改變，一般論者依據教育令的頒布與修正，將其分為四個時期，爰分述之：

第一期：自臺灣改隸到發布「臺灣教育令」（1895—1919）

此時期的學校教育主要依據首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圖一）所

規劃的臺灣學制計畫及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教育無方針主義」執行，對臺人教育採取消極、放任態度。伊澤氏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曾留學美國研習音樂及師範教育，也曾進入哈佛大學理學部學習，伊澤曾向樺山總督力主推廣日語應同時重視臺人母語，且應尊重臺人崇敬孔子的良俗。渠認為臺灣學校教育，第一為緊要事業，即講習員之培訓（圖二）；第二為永久事業，即國語（日語，下同）學校及師範學校的設立。講習員招募的對象是日本本土的小學教員，共舉辦七次，畢業生合計 264 人，分發全省各地國語傳習所任教，成效卓著。

1896 年設立國語學校（圖三）及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設有師範部，培訓日籍教員，學生在日本本土招募，在臺灣施以二年的訓練。另設有語學部，分設國語學科及土語（臺語）學科，對內地（日本）人授以臺語，對本島人授以日語。同年五月，在臺北等全省十四處所，設立國語傳習所，培訓通譯人才。

1897 年設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修業年限六年，專收日人兒童，作為對在臺日人兒童之初級普通教育機構。翌年三月增設尋常中學科，修業年限五年，招收日人子弟，是臺灣有新式中學教育之開端。

1898 年發布「臺灣公學校令」，並在全省各地設置公學校，招收臺籍兒童（圖四），對於原住民子弟另設蕃人公學校，是臺灣普遍實施初級學校教育的開始。為因應師資需求，於 1899 年設置臺北、臺中、臺南三所師範學校，培訓臺籍教員，但由於當時一般臺人對送子弟到公學校就讀仍採取排斥態度，公學校就學率不高，師範畢業生分發困難，乃先後將該三校廢止，在學學生併入國語學校另設立師範部乙科。

1905 年日俄戰爭日本獲勝的結果，大出臺人意料，同時島內反對日本統治的武裝力量，也被日軍掃蕩殆盡，此時臺人開始覺悟必須與日人合作，提

昇知識，才能生存發展，一時之間，求學意願大為增加，公學校就學率大幅提高〈圖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原則，引起世界弱小民族普遍共鳴，而這種思潮也傳播到了臺灣，同時在日本的臺灣留學生與中國留學生交往的結果，深受辛亥革命精神的感染，對於殖民地政府種種專制統治及日、臺人不平等的待遇，發出深切的不平之鳴，結合日本國內同情臺灣處境的人士，採取政治鬥爭的方式，爭取臺人的自由與平等，逼得執政當局不得不稍加重視。

此一時期教育工作的重點在於：培訓教員、廣設初級教育機構，以加強日本語之推廣及教授臺人初級農工知識，使其成為馴良恭順，具有優質生產能力的殖民地人民，同時教授來臺日人必需的土語〈臺語〉，以應公私業務需要。但有三個現象逐漸顯現，第一：教育法規日漸完備。第二：就學人數不斷增加，至1918年公學校在學人數已超過十萬人。第三：基於臺人對教育質量之不斷要求，開始設置供臺人子弟就讀之中等學校〈圖六〉。

第二期：自發布「臺灣教育令」到「改正臺灣教育令」(1919—1922)

經過二十多年來不斷的努力，日本對於臺灣的統治已步入軌道，在帝國資本主義政策引領下，為開發產業，各項基礎建設逐漸完成，農、工、商業突飛猛進，臺灣不但成為日本「展翅雄飛」華南與南洋的跳板，也是它經濟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經濟與財政上對日本母國提供了鉅大的回饋，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風起雲湧的民主主義與民族自決思想，也給臺灣的民心帶來莫大的影響，紛紛要求自由平等，為安撫臺灣人心、開發臺灣產業、建立南進基地，改善臺灣的教育制度，以回應臺民的要求、適應實際的需要，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臺灣教育令」是對當時臺灣的教育制度所做的全面的檢討與改進後的產物，不但制度上有許多變革，也新設立了許多學校，在中等教育方面，設置了招收男生的高等普通學校和招收女生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職業教育方面，將總督府工業講習所改為臺北工業學校，新設了臺中商業學校和嘉義農林學校。並將原設置在公學校的實業科廢止，另設簡易實業學校。師範教育方面，廢止國語學校改稱為臺北師範學校〈圖七〉，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改稱為本科，甲科改稱為公學師範部，國語學校臺南分校改稱為臺南師範學校〈圖八〉。專門教育方面，將總督府醫學校改為醫學專門學校，並新設立了臺北農林專門學校和臺南商業專門學校。

「臺灣教育令」的頒布，在臺灣教育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樹立了臺灣的學制，使臺灣的學校教育無論在質量上或數量都向上提升了許多，為臺灣日後的發展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第三期：自「改正臺灣教育令」到「臺灣教育令中改正」〈1922—1941〉

由於臺灣對日本的重要性不斷的增加，臺灣民眾對所遭受到的日、臺人不平等待遇以及總督府的專制統治，日益不能忍受，加上世界局勢的影響，終於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揚棄一向對臺灣所持的「殖民地主義」政策，改採「日本本土延長主義」，推行皇民化政策，掲橥「一視同仁」、「日臺融合」的口號。將領臺二十多年來，以總督的統治為中心的「律令主義」改為「日本本土法律延長主義」，只要在臺灣的狀況允許的範圍內，儘量依照日本本土的法制來實施。

「改正臺灣教育令」就是在前述背景下的產物。廢除「日臺分學」，改採「日臺共學」，在教育上不再區分日本人、臺灣人，除初級教育以日語的常用與否，區分為小學校〈圖九〉、公學校〈圖十、圖十一〉外，中等以上教育則

完全不作任何區別（圖十二—圖十六）。同時為因應「日臺共學」的需要，開始增設高等學校、中學校以及專門學校，教育質量不斷充實。到 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圖十七）創設後，臺灣的學制已經達到完整的地步。但實施共學制，中、大專升學考試，臺灣學生卻必須面對不平等的錄取標準與日本學生競爭，在差別的教育基礎上，反而產生就學機會被日人剝奪的現象，形成日人占優勢的臺灣中等以上教育資源的局面。



此一時期整個世界局勢，波濤洶湧，列強國家莫不盡力於軍備的擴張，縱橫捭闔，各結奧援。日本國內政情也極為動盪不安，法西斯主義思想盛行，軍部主導整個日本政局，引領國家機器，逐步走向戰爭邊緣。1931 年發生「918〈滿州〉事變」，日軍佔領整個東三省，設立「滿州國」，中日關係極度惡化，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終於引發全面戰爭，臺灣繼日本之後進入「戰時體制」，擔負起協助日本成為「高度國防國家」的重大責任，學校教育也受到戰爭的影響，在課程方面增加了日語與日本歷史的教學時數（圖十八），在教學活動上增加了時局講解（圖十九），宣揚皇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英勇戰績（圖二十、圖二十一），以激發學生的愛國心，同時動員學生參與各項與軍務有關的活動，例如：歡送、歡迎出征或回歸的軍人，寫軍信慰問前線將士，參加慶祝戰捷的遊行，參加戰死軍人的祭典，為出征軍人家庭提供義務勞動等等。

第四期：自「臺灣教育令中改正」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1—1945）

1941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遵循日本之後，修正「臺灣教育令」，將臺灣的初等普通教育一律改為依照「國民學校令」實施，廢除公學校與小學校的區別，一律統稱為國民學校（圖二十二、圖二十三），但為適應實際需要，仍將課程分為一、二、三號表，以分別教導日人、臺人及原住民兒童。國民學校的課

程亦在此時被統合為國民科、理數科、體鍊科、藝能科及實業科等五大科目。

為了要在臺灣全面實施徵兵制，1943年4月，臺灣開始實施國民學校義務教育，但當時臺人兒童就學率尚未達到百分之六十，及齡而不就學的兒童約有四、五十萬人之多，一旦全面立即實施，教學設施與師資都將面臨嚴重困難，因此，決定先從最初的1943年度第一學年之適齡兒童開始適用義務教育制度，同時對家境窮困、交通不便的兒童亦可免除其就學義務。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部窮兵黷武，藉機急速擴大軍備，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陸軍編制高達五十一個師團，包括航空兵力在內，約有二百十一萬人左右。海軍聯合艦隊也由下轄三個艦隊擴充到八個艦隊及四個直屬戰隊，擁有各式艦艇三百九十艘，總噸數達到一百四十五萬噸，飛機約二千三百架，遠遠超出中國戰區實際作戰需要。為了維持如此龐大的軍力以及急遽增加的軍需工業需求，不但兵源緊張，社會勞動力也明顯不足，日本政府乃於1941年10月頒布敕令，規定大學、專門學校以及實業專門學校的修業年限，得以縮短一年。臺灣總督府也隨即頒布命令，自昭和十六〈1941〉年度起將臺灣各大學、專門學校、實業專門學校、大學預科、高等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及實業學校的修業年限分別縮短三個月至六個月不等，一直到戰爭結束。除了上述臨時措施外，更採取變更學制的方式，將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及中等學校等之修業年限予以縮短一年，俾使學生能早日出校服務。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軍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全球捲入戰火之中，臺灣成為日本在南方作戰最重要的據點，不僅是海、空軍直接出擊的前進基地也是日軍訓練、集結的中心，軍隊、裝備、補給由此源源不絕開赴南洋諸島以遂行作戰任務，而在南洋所搜括到的石油、

橡膠、錫、銅、鎳、鋅、錳等重要戰略物質也經由臺灣輸往日本，臺灣的戰略地位益形重要。



隨著戰局擴大，臺灣總督府於 1942 年 1 月 3 日仿效日本國內的動員基準，制頒學生奉公隊章程做為學生修鍊組織的準則，聚集學生力量，從事各種服務工作並接受國防軍事訓練（圖二四一圖四十）。1944 年開始，太平洋戰爭的局勢逐漸對日本不利，該年 2 月 25 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決戰非常措施綱要」，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必須在「今後一年，全時參加勞動及其他非常勤務工作，以因應戰時體制之需要」。1944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同時發布「學生勤勞令」及「女子挺身隊勤勞令」徵集男、女學生分別從事糧食生產、陣地構築、軍事勞動、戰技訓練、病患照顧等工作。1945 年 3 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決戰教育措施綱要」，除國民學校初等科以外，其他學校自 1945 年 4 月起至翌年 3 月底止停止上課，臺灣亦比照辦理，國民學校高等科及中學低年級學生被徵調到陣地、軍需工廠服務，其他中學高年級以上學生全部都接受警備召集，從事陣地、基地、海岸地等的第二線防衛工作。

1943 年 11 月 25 日起，美國軍機開始轟炸臺灣，初期以各軍事設施、機場、港口為主要目標，至 1944 年年底逐漸將轟炸範圍擴及臺灣各主要城鎮及其他公共設施，因而造成無數平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戰爭末期，空襲頻仍，學校被迫停課，許多校舍燬於戰火，是臺灣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期。

綜觀日本治臺五十一年，其所推行之學校教育有幾個重點與特殊之處，值得吾人回顧。

第一：提倡實學、廣設學校：臺灣普及化的新式學校教育是由日本人所創建，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也是日人所完成，廣設國民學校及實業（含實業補習）學校（圖四十一圖五十一），在日治末期，前者達到 1,

099所，在學人數 932，525 人，後者達到 117 所，在學人數 32，718 人。同時所編訂的教科書，內容活潑生動，重視實學教材，強調科學與日常知識，與生活及環境密切關連，對奠定臺灣學制，啓迪臺人知識，提昇臺人技能，發展臺灣經濟，影響深遠。

第二：差別待遇的殖民地教育：日人在臺設立學校，教育臺民，最初目的是推廣日語，訓練通譯，使上情能夠下達，便於統治。同時廣設公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培訓服從勤儉之低級勞動人力，供其驅使〈圖五十二—圖六十〉，以開發臺灣的資源，達到「殖產興業」回饋日本母國「富國強兵」的目的，因此，對臺人與日人子弟採取「分學制度」，涇渭分明。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就曾公開表示：「教育是雙面刃，沒有必要讓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直截了當的說明了統治者對殖民地教育的態度。即使到 1922 年迫於形勢，修正「臺灣教育令」改採「共學制度」後，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不論在推行「皇民化」的過程中，口頭上如何強調「一視同仁」、「內臺一如」，實際上對臺人子弟就讀中等以上學校，仍設有嚴格限制，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有關「內訓」的規定，臺灣總督府按例於每年十月以「內訓」的方式，向各中等以上學校校長，下達下學年度日、臺人入學比例之指示，除少數以臺人為主體的學校，如臺北二中〈圖六十一、圖六十二〉、臺中一中〈圖六十三、圖六十四〉、臺南二中〈圖六十五〉等臺人名額高於日人外，大部分中等以上學校〈含師範學校〉均以日本學生為主體，其招收臺灣學生之比例非常低，大致僅在百分之五到十五之間，不論考試成績如何，此一比例不能打破，當時在臺日人佔總人口數不過百分之六左右，卻壟斷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中上學校的教育機會，不平孰甚？同時在教育措施上也完全基於日本本國或日本人的利益為考量，試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圖六十六〉設立，這在臺灣教育史上固然是一件劃時代的創舉，但花費甚大，第

一年就撥款一百一十萬七千日元，佔整體教育預算中很大的比例，臺北帝大設校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解決臺北高等學校〈圖六十七〉應屆畢業的七十餘名日籍學生升學的需要，而他們原本很容易就可以在日本內地接受同樣的高等教育，卻在這裡受到特殊的照顧，對照當時臺灣適齡兒童就學率僅有百分之二十八，其餘百分之七十二之兒童未能入學，主要原因是公學校校舍不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在臺灣興辦中等以上學校教育，主要目的是在營造一個適合日本人居住的環境，以鼓勵移民，至於臺灣人的教育程度是否提昇則非其關心所在。1895年日本領臺，前十年日本政府每年補助臺灣將近百日幣一百萬元，1904年起臺灣財政上可以自給自足，隨著產業進步、工商發達、稅制完整，到1919年的歲入決算已超過日幣一億元，財政上非常寬裕，堪稱「眩惑的黃金時代」，但日本政府始終不願意讓臺灣仿效日本早已實施數十年之久的國民義務教育，能拖就拖，一直到二戰末期，日本軍部因戰局不利，被迫要在臺灣實施全面徵兵，為符合國際法—在殖民地必須實施義務教育後才能徵兵—的規定，於1943年倉促推出國民義務教育制度，雖已無補於大局，但統治者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蠻橫心態則暴露無遺。

第三：教育思想的矛盾與錯亂：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引進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起自小學到大學的近代學校體系，並且以強制的手段加以推展，使其迅速普及，提昇人民知識，此固明治維新能夠成功原因之一，但西方近代教育的基本精神在於強調自由、民主、平等，以個人為主體，培養獨立自主的近代國民，日本由於受到傳統儒教的深遠影響以及「國體」的特殊需要，將這個基本精神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1890年以天皇敕令公布的「教育敕語」〈圖六十八〉，是戰前日本學校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教育敕語」中，將層階式的東方儒教主義的忠孝觀念與遵守憲法的原子式的近代國民理念合而為一，以致於充滿了內在的矛盾。日本領臺以後，這樣的教育思想也

隨著移植來到臺灣〈圖六十九—圖七十二〉，加上刻意隱藏在殖民教育中的種種陷阱與高漲的軍國主義思想，終於讓臺灣人走入重重迷宮，不但未能創建具備近代意識的國民，甚至產生嚴重的認同錯亂。

第四：教育工作者教學態度的認真與師生關係的密切：二次大戰結束，日籍教師遣送返國，迄今屆滿六十年，但當年的日籍老師與臺籍學生間仍有保持密切連繫者，每當母校遇有重大慶典，也有許多日籍老師獲邀遠從日本前來參加，已經灰白了頭髮的學生們群聚機場盛大歡迎，對老師的尊敬絲毫不減當年，令人印象深刻，此一現象之產生固然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蓋日治時期，學校教育是社會上極少數的權威之一，尤其就知識的傳播而言，幾乎是唯一的，在特殊設置的校園環境中，透過服制、儀式以及嚴厲的教學要求，自然而然讓老師成為學生仰慕崇敬的對象。但最主要的，還是老師教學態度的認真與對學生的關懷〈圖七十三—圖七十六〉。在很多相關的著作或者老的回憶中都提到，當年老師如何利用課餘時間，為有意升學的同學義務補習，不收取任何費用。在資訊匱乏、窮困的時代如何自掏腰包，訂購課外刊物供學生閱讀，以吸收更多的知識，培養廣泛的興趣。如何利用假日帶領學生到臺北城玩、看電影等等，對這些陳年往事都有詳盡的描述與追憶。臺北市北投國民小學百年校史紀念專輯記載，1945年該校有一位名叫久保的女老師在遣送返國前夕，慌亂倉促之際，還特別再到教室去看望學生，其依依不捨之情，躍然紙上。同時日治時期每個學校幾乎都有以教員為主體的教授研究會、教材教法研究會、每週反省會……等組織在熱烈的推動著，相互切磋，以提昇教學品質，其態度的認真與嚴謹，可見一斑。

日本自1895年領臺到1945年臺灣光復，前後凡五十一年，從設立國語傳習所教授臺人日語開始，到創設臺北帝國大學，建立完整的近代學校教育制度，培育優秀人才，這中間經歷了許多的轉折以及臺民血淚奮鬥的過程，生

動反映了當時臺灣經濟逐漸開發、民智日益提昇、地位益趨重要的實際景象。同時這段時期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發生了許多影響深遠、可歌可泣的事件，辛亥革命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達到頂端，共產主義興起，「民族自決」的呼聲響徹雲霄，相繼發生一次、二次世界大戰，漫天戰火，造成無比的浩劫，同時科技的進步一日千里，使人類的生活方式有了重大改變。凡此種種，都給當時的臺灣帶來巨大的衝擊。日本由於軍國主義的崛起而佔有臺灣，耀武揚威，睥睨天下，卻也因軍國主義的過度擴張而終於招致覆敗的命運，自己成為被佔領國，害人害己，犧牲了無數寶貴的生命、財產。撫今追昔，世局的變化，因果的輪迴，給了我們許多的啓發與省思。

導 讀

本次編輯的圖錄，資料的採集，主要係以公開徵集的民間收藏為主，其他政府機關的典藏品，僅參加本次特展之展示，未列入圖錄之中。圖錄編排的方式，分為兩大部分，分別為依主題編排之本文及附錄。在本文的部分依個別主題做整體性的介紹，並將相關的圖片插入文案之中。圖片之下，為避免文字過於繁複，影響美編，僅標示簡易的件名。附錄部分則包括：一、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法令索引：自明治二十九年至昭和二十年，凡刊載於臺灣總督府發行之《府報》、《官報》，並於臺灣地區施行之教育相關法令，依其公布時間順序，整理分類，詳列出處；二、日治時期臺灣學校一覽表：含各學校創立時間、歷屆校長姓名、相關沿革等；三、展件清冊：包括詳細的展件名稱、圖號、學校隸屬的州別、教育等級、提供者姓名、尺寸等，以利讀者對此次徵集到的展件，做整體性的了解。

圖錄本文依主題不同，分爲：一、總論。二、課程。三、學校建築。四、校歌〈附校旗〉。五、制服。六、「修學」旅行。七、時局。八、「內地進學」。九、社會教育。十、大事記等篇，其內容簡述如下：

一、總論

將日治時期的教育概況做一個全面簡要的敘述，以及本次特展辦理的緣由、目的，籌辦經過以及各主題內容的簡介。

二、課程

依據初等普通教育、高等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六大單元，將日治時期各級學校的教學課程做一個完整的介紹，俾讀者可以了解日治時期教育的重心所在，也可以跟現行教學內容作一個比較。

三、學校建築

本篇內容有：一、荷西、明鄭、清領時期學校設立的沿革及校舍建築的簡略介紹；二、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建築的相關法令；三、木造的校舍；四、磚造的校舍；五、鋼筋混凝土造的校舍；六、學校建築的內容；七、結語。其中木造、磚造及鋼筋混凝土造的校舍，分別從盛行的年代、建築風格及校舍外貌加以分析。學校建築的內容則分別從校門、校舍本棟、講堂、雨天體操場、武道館、一般教室、特殊教室、銃器室、學生宿舍、校內神社、奉安殿等，配合畢業紀念冊裡的圖像加以分類說明。

四、校歌（附校旗）

本次特展的畢業紀念冊中計採錄到 48 個學校 49 首歌詞，其中 12 個學校除歌詞外尚有完整的歌譜，計有公學校 5 首、中學校 4 首、高等女學校 1 首、職業學校 2 首。

校歌與校旗是學校的精神象徵，校歌的歌詞通常會傳達創作者、學校主

政者或當時的教育理念，透過歌詞的內容及歌曲音樂節奏的不同，可以顯現學校的特色。本次特展圖錄中的校歌及校旗篇，在校歌的部份，經由歌詞的意釋及分析，將有助於瞭解當時教育政策、學校主政者的教育理想。校旗的部份，則經由圖像的分析，瞭解當時設計的規則。

日治時期臺灣校歌的組成素材，包括一、對學生的期許；二、學校所在地地理景觀的描述；三、與天皇、皇太子、神社及日本國相關者；四、與地方的歷史與學校的創立相關者；五、學校屬性的呈現；六、將南進及興亞納入及七、其他等，當時的校歌大部份含有對日本國的認同，少部份的校歌則能擺脫當時的政治氛圍，完全沒有與同化政策相關的詞句，另從歌詞的分析中，亦可見到教育等級、屬性及性別的不同，在歌詞中所呈現的差異性。

校旗的設計規則，依照圖像的屬性分為一、公學校及小學校的校旗；二、中學校、高等女學校的校旗；三、師範學校、高等學校及帝國大學的校旗；四、職業學校的校旗。其中公學校及小學校的校旗設計規則，約略可分為一、只有簡單的圖案；二、只在圖案中將部份校名呈現；三、僅書寫校名；四、圖案外有學校全名；五、圖案中有校名簡稱或性別，在圖案外有校名；六、僅在圖案中加入學校全名等六項，可含括其他等級學校的校旗設計規則，依學校的等級及屬性分開說明，是為了將其主要的規則能更明顯的呈現。

五、制服

日本領臺之後，引進了近代學校教育，學生制服也制度化，包括服裝、髮型、鞋帽等。透過畢業紀念冊、照片等所呈現的影像資料或口述，予以歸納，包括日常便服、男生國防色制服、女生海軍水兵服、男生仿陸軍服、女生白底背心裙、男生西裝領外套、其他式樣女生制服、專門學校、帝國大學與師範學校制服等。

日治之初，本島學生，仍存在辮髮〈男生〉、纏足〈女生〉的現象。辮髮走入歷史後的學生頭髮，中等學校以下男生幾乎都是清一色理光頭。相對於男生的單調，女生在頭髮方面，則顯得多采多姿，如辮髮型、清湯掛麵型、混合型等。

此外，日治時代小學生，除了都市的學校，不論是貧苦家庭、中上家庭，打著赤腳的情形，極為普遍，且濱海地區的學校，幾乎全數赤足上下學。

六、「修學」旅行

遠足，顧名思義，便是由老師率領學生至近郊徒步旅遊，最初限於體力，學校通常都會依學童年齡分別安排路程，大抵以當天往返為原則，後來更發展為搭乘車船的「長途遠足」，而有「修學旅行」名目；據說明治 19 年（1886）2 月 15 日東京師範學校舉行的「長途遠足」，一般都視為「修學旅行」的起源。

大抵小學階段的學校，幾乎只有遠足活動，極少數都會地區學校，偶而也出現「修學」旅行；中學以上學校，大都遠足、修學旅行兼而有之，幾個著名學校甚至有前往日本的「修學」旅行活動。中學以上學校的畢業紀念冊，內容較為豐富，甚至是由各班畢業生推派代表共同編輯，遠足、「修學」旅行紀念照的呈現，也較為頻仍，透過照片顯示的地點，略加歸納，約可分為下列各種類型：名勝古蹟旅遊、知性參訪、精神教育、鍛鍊體魄等。

七、時局

昭和 12 年（1937），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臺灣總督府為配合此一局勢，即展開「皇民化運動」，翌年，更公佈實施「國家總動員法」，使臺灣迅速整備進入戰時體制。昭和 16 年（1941），日本侵華戰爭已成泥足深陷的長期戰爭，臺灣成立了「皇民奉公會」，將臺灣人悉數納入此一組織，以便推行「皇民奉

公運動」配合戰時行政。

各級學校學生當不能自外於這個體制，甚至是站在推動皇民奉公運動的第一線，若干學生參與的政策性活動，都拍有照片，這些照片往往編入紀念冊，雖是作為學生生活點滴的回顧，卻也忠實反映了當時的時局，特別是有關於侵略戰爭方面。

綜觀整個畢業紀念冊所保存的史料，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自昭和 12 年蘆溝橋事件，以至昭和 17 年（1942）6 月中途島之役日海軍大敗，戰勢逆轉為止；此後以至昭和 20 年（1945）8 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為止，視為後一階段。

畢業紀念冊中，恰為臺灣這段戰時體制留下珍貴影像，約可歸納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教師應召從軍、「戰捷」慶祝（包括漢口「陷落」、汕頭「陷落」、香港「陷落」、馬尼拉「陷落」等）、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獻機與防空、其他（如神社祭拜、廢品回收、軍人及遺族慰問、宣傳及宣傳品製作、勞動服務）等。

八、「內地進學」

1895 年，日本領有台灣，五年後，東京已經有了台灣學生。至 1912 年，東京的台灣學生日益增加，為了因應此一趨勢，台灣總督府特別在東京設立台灣學生宿舍「高砂寮」，據統計，1922 年學生人數，已從 1915 年的三百餘人，急遽增至二千四百餘人。

日治時期臺灣人赴日求學，學校性質不一，因素也甚為複雜，大約可歸納如下幾種類型：一、身份的表徵：台灣紳富家庭，炫耀身分地位。當其子弟小學畢業之後，往往送到日本接受中學教育。二、臺灣教育制度問題：日人統治台灣，實施不平等的差別教育，台灣的中等及高等教育，日人子弟佔據絕大半名額，因而逼使台灣青年紛紛赴日「進學」。三、特殊領域深造：少

數特殊領域的深造，臺灣本島無專門學校，有志於向該領域發展者，勢必選擇日本「進學」一途。四、就業因素：也有赴日工作，利用工作之餘，進入職場鄰近學校就讀者。

日治時期的赴日青年學生，一反傳統讀書人追求功名的現象，他們開始接觸到日本民主主義思想，開始介入台灣前途自決運動，並肩負起引導作用。對於台灣的影響極為深遠。

九、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不受時空的限制，影響範圍較之學校更廣闊，因此日本殖民統治者十分著力於此。本章主要討論國語講習所、職業講習所或職業學校、青年學校三種制度，除了介紹其傳承與演變，並透過照片來發掘當時社會教育的特別風貌。

國語講習所肩負以語言同化殖民地的任務，為了推廣，在各地有各種因地制宜的制度跟景況，而其開放各種身份失學者入學的特點，讓許多女性在尚未開放的社會中，得到寶貴的學習機會。職業教育內容應著重技能的培養，然而從種種跡象中顯示，日方所重仍是愛國思想與經濟殖民。青年教育則是針對青少年特有的熱情，灌輸其愛國主義與軍事教育，俾使成為戰場上的人力資源。

要言之，日人對社會教育的重視增進了臺人的教育知識水平，但伴隨而來的是對臺灣更全面的殖民控制，這是要理解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時，必要注重的背景。

十、大事記

將日治時期臺灣教育上所發生的重要事件，依時間先後予以排序，一一臚列，俾使閱讀者，能夠輕易了解歷史發展的軌跡，掌握全盤狀況。

後記

日本治臺前後凡五十一年，這一段歷程，對臺灣日後發展，影響深遠，日治時期將近代新式學校教育制度引進臺灣，提倡實學、廣設學校，不論其動機如何，對提昇臺人知識，促進臺灣現代化，具有相當貢獻。但戰後由於民族間糾結的情感因素，對這一段歷史，大都避而不談或有意的予以忽略，致使所存之有關檔案大量流失，對於教育史料的建立，備感困難。

本館有鑑於日治時期各學校於每屆學生畢業之際，例有畢業紀念冊之印行，這些存世的紀念冊，在相關檔案散佚之年代，適足以發揮其文獻史料價值，因此，特別擘劃「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料〈畢業紀念冊〉特展」。從 2004 年 3 月開始，將相關的訊息在本館網站上公告，另由館長劉峰松先生率領編輯組同仁，透過各地區文物（史）協（學）會的協助，多方搜尋拜訪，承尤朝恭先生、王銘鉶先生、朱錦城先生、朱鴻華女士、李天德先生、李國隆先生、林文龍先生、林正三先生、林東陽先生、施錦鋒先生、柯鴻基先生、洪敦光先生、紀忠男先生、紀雅博先生、翁清潭先生、張吉永先生、張良澤先生、張敦智先生、張黃雪妹女士、張維信先生、張慶龍先生、梁志忠先生、許朝南先生、郭双富先生、陳仁郎先生、陳春輝先生、陳張若女士、陳理厚先生、陳盛增先生、陳博馨先生、陳達明先生、陳廣隆先生、陳慶芳先生、陳麗全先生、黃天爵先生、黃然民先生、黃榮洛先生、楊肇敏先生、楊蓮福先生、溫文卿先生、詹文杰先生、詹評仁先生、廖榮章先生、劉世光先生、蔡振蘭先生、蔡新生先生、蔡煌春先生、蔡麗美女士、蔡耀光先生、賴貫一先生、戴瑞安先生、蘇全正先生、蘇東榮先生、鐘金水先生、〈依姓氏筆劃次序排列〉以及九份鄉土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中市大同國小、臺中市新民高中、臺北市中山女中、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縣五股國小、臺北縣新莊國小、台灣風物工作室、林仔街文史工作室陳惠聲先生、秋江紀念館

籌備處、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南投縣史港國小、南投縣鹿谷國小、屏東縣光華國小、財團法人半線文教基金會、桂田文史工作室、笨港文化會館、國立臺南一中、國立嘉義高中、國立鳳山高中、國家圖書館、嘉義市崇文國小、彰化縣芬園國小、澎湖縣文化局、雙清文獻研究室陳進乾先生等〈依筆劃次序排列〉私人收藏家及公、私立機構，大力襄贊，捐贈或無償提供相關畢業紀念冊六百餘冊、畢業照近三百張。歷經四次籌備會議，挑選出展品九百零五件，除辦理展覽外，並將採用其內容，配合本館所典藏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及府（官）報，製作日治時期臺灣學校一覽表、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法令目錄索引、編撰相關圖錄及舉辦學術研討會，以充實臺灣教育史料，體現日治時期教育概況。另於本館卸展後，展出之圖片並將安排巡迴各地區學校或圖書館繼續展出，俾深入基層，擴大效益。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迄今剛好屆滿六十年，六十年俗稱「一甲子」，在傳統曆法上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含有周而復始，萬象更新的意思。我們衷心期盼藉由這次特展，能讓全體國人對這段影響臺灣深遠的歷史有更多的認識，對記載這段歷史的文物史料的維護、保存更加重視。回顧過去，策勵未來，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不斷的提昇教育品質，培育出健全優秀的國民，結合世界潮流，與時俱進，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傑出。

～參考書目～

- ◎程大學著 重修臺灣省通志—日據時期的學校教育、日據時期之教育行政 出版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李園會著 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 主編者 國立編譯館
- ◎陳水逢著 日本近代史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
- ◎林茂生著 林詠梅譯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 出版者 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 ◎徐南號主編 台灣教育史 出版者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 ◎李永熾著 日本近代史研究 出版者 稲禾出版社
- ◎矢內原忠雄著 周憲文譯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出版者 帕米爾書店
- ◎蔡禎雄著 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 出版者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 ◎黃文雄著 楊碧川譯 締造台灣的日本人 出版者 一橋出版社
- ◎周婉窈著 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第四卷第二期
- ◎杜武志著 日治時期教育制度之回憶 臺北文獻直字第一四六期
- ◎邱敏捷著 論日治時期台灣語言政策 臺灣風雲四十八卷三期
- ◎許佩賢著 皇國健兒之道—學校的戰爭動員 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出版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陳文添著 日本攻略菲律賓戰役中的臺灣 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出版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楊晨光著 戰時體制下台灣的軍國教育 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出版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